



“场域－惯习”视野下 劳动参与的性别化机制

——基于一名 80 后流动女性的个案分析

□ 邱幼云

摘要：本文引入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框架，对一名 80 后流动女性 M 女士的劳动参与历程进行分析与解读，探讨性别角色差异如何形塑农村女性进城后的劳动参与机会和空间，以及流动女性如何在场域生成的结构中学习并运用能动的策略并赋予劳动新意义。在“场域”从农村共同体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过程中，行动者作为主体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从观念到身体，到具体的行动策略，并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可以自我认同的社会位置，通过资本积累和自我再生产进而形成了新的惯习。因此本文呈现出与自由主义话语和批判论不同的理论视角，即通过“场域－惯习”来展现出社会行动者自身的意义世界、行动策略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关键词：场域；惯习；劳动参与；社会性别

一、问题提出

中国的经济改革促进了新的性别化劳动参与实践，大量的农村女性离家进城，参与到城市劳动市场中。大多数流动女性在劳动参与中从事底层工作，被普遍视为“弱势群体”，这点与男性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性别、婚姻、年龄等的限制，流动女性在城市劳动参与上的体会与男性有所不同，有其独特之处。

关于女性移民与劳动参与的研究，学界流行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自由主义式的“机会”“空间”话

语，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和空间，提高女性福利^[1]；二是采用批判论的“剥削”“压迫”“不平等”等话语，强调女性在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中是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受到剥削^{[2][3]}；三是上述两者的折中，认为城市化让女性在经济上有获益，但在社会中仍处于被孤立和被边缘化的境地^{[4][5]}。对中国流动女性的研究更多地带有批判色彩，即看到市场化给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强调她们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边缘化与弱势境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遭遇的不平等^{[6][7]}。上述观点为本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但这些研究忽

略了流动女性个体的主观感受及其在制度限制下发展出来的能动性。被忽略,非常缺乏在韦伯“理解社会学”的意义上对社会行动者自身的意义世界及行动策略进行解释,并据此透视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基于此,本文引入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框架对一名80后流动女性的劳动参与历程进行解读,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社会性别如何型塑流动女性劳动参与的机会和空间?流动女性采用何种策略来应对,如何解读自身劳动参与经历并赋予其意义?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收集资料并进行剖析。笔者尊重受访者的回忆,按照受访者M女士的生命故事与背景加以调整与修订,试图在访谈互动中理解M女士如何建构自己的劳动参与经历并赋予其新的意义。个案的基本情况如下:M女士生于1982年,浙江衢州人;1997年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两年;1999年到杭州打工,期间频繁换工作,10年间做过8份工;2008年与丈夫一起开了一家美容美发店,经营至今。

二、流动女性劳动参与中的性别化机制

1. “有工可做就好”与“用脚投票”

M女士在打工的10年里做过8份工,最短的一份工干了20天,最长的也不过两年半。每辞去一份工,在很短时间内(通常是一个月不到)就找到了下一份工作。她认为“一个人出来要完全靠自己,要租房子、要吃,不可能停下来的”,是迫于生计不得不迅速找到下一份工作。实际上,不仅是M女士,其他流动女性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大都比男性要短^[8]。M女士认为这是因为“女的(工资)要求低,比男的好找。比如同样一个月3000元,女的能接受,男的要养家,就不一定会接受了。(我)有工可做就好,再怎么花时间去找不到好工作的。一份工作,男工能做,女工也能做,老板一般会选女工”。

M女士的看法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方面,流动女性对工资要求不高,期待较低。这与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有关——男性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而女性的收入只是辅助性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流动女性对找到一个“好工作”的期待更低,更容易接受不利的工作环境和社会地位低的工作,正如M女士一再强调的“有工可做就好”。并且她也接受了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放弃了多花一点时间去找一份“好工作”——除了收入还有福利(假期、保险、医疗等)、合理的工作时间、社会声望、培训和提升

机会、较低的职业风险(如失业,欠薪等)、技术上的成就感、自我控制空间、权威感、组织状况良好等^[9]。按照这种界定,M女士做过的每一份工都算不上“好工作”,从事“好工作”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所以她很自然地放弃对“好工作”的期待。另一方面,流动女性对好找工作的感知还与劳动力市场的青睐有关。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全球资本积累的重要策略^[10]。来自农村的流动女性很受雇主欢迎,因为她们身上具有吃苦耐劳、灵活柔韧等特征,并且多数女性缺乏谈判力,面对不利的就业条件只能采取无条件忍受的态度和做法,在工作中碰到麻烦与委屈的应对策略往往是逆来顺受,她们很少进行有组织的抗争。

可见,“好找工作”实际上是在父权制规制与市场-企业的场域规则的共谋下,流动女性甘居后位、接受弱勢的不得已选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流动女性就丧失了能动性,在多重压力下,她们发展出了更加灵活的策略来应对这种被动处境,那就是频繁跳槽、“用脚投票”。对于劳动者离职率高、流动性强的解释,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工作条件差、收入低^[11],有学者则认为这是缺乏技术的劳动者试图通过改变工作地点等来改变工作中的单调^[12]。事实上,笔者更倾向于将频繁跳槽解读为流动女性争取主动权的一种消极对抗。80后的M女士不像上一代那样善于忍耐,每当“受气”超出她的承受范围时,她采用的策略就是离职走人。在10年艰辛的打工生涯中,当忍耐不下去的时候,M女士都是以“用脚投票”来把握劳动参与过程中的主动权。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用脚投票”策略其实只是从一份“坏工作”到另一份“坏工作”的横向流动,并没有实现职业发展的向上流动,这只是个体争取主动性的一种消极应对策略,体现了场域规则限制下行动者的主动性。

2. 触顶“玻璃天花板”与自我放弃

赚钱是进城的重要目标,升职意味着工作受重视,有涨工资的机会。然而,流动女性的升职机会并不多。M女士唯一的一次升职是在一家小型服装公司当质检的时候被老板提升为主管。因为她非常努力,公司业务好的时候没日没夜地干活,经常每天晚上加班到十一二点,有一年甚至连春节都在加班。对于升职是否受性别影响,M女士略作思考,答道:“老板一般不会因为你是女的就不让你升职。但是女人事情确实比较多,没法像男人那样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工作上。而且,工厂里女人居多,三个女人一台戏,谁也不服谁……如果主管是男的,女人比较服气。”

M女士说出了升迁决策背后的性别操作。在职业



发展中,很多有管理能力的女性经常会触碰到“玻璃天花板”(“玻璃天花板”是一种比喻,指的是设置一种无形的、人为的困难,以阻碍某些有资格的人,特别是女性,在组织中上升到一定的职位),雇主更倾向于提升男性而非女性,这点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女性还是城镇女性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女性的职业发展与生命周期发展到何种阶段高度相关,婚姻、生育、家庭等对女性的职业发展都有负面影响^{[13][14]};另一方面,流动女性多数聚集于“女性行业”中,存在各种不同的相互分离的小团体^[15],在女工居多的工作环境里,男性主管更加有号召力。

事实上,在10年的打工生涯中,M女士还有另外一次升职机会。当时主管有意把当操作工的她调任为办公室文员,每个月多出200元的工资。虽然工资并没有多大幅度的提升,但在M女士看来这是升职,因为在车间工人看来,“在办公室比在工厂高级”。然而,面对来得有些突然的升职机会,M女士犹豫再三放弃了,“工资高一点,要付出的肯定要多,再说,我只有初中文化,即使去做办公行政,也肯定比不上大学生”。她不相信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选择了自我放弃。在传统的性别意识下,流动女性把社会和家庭对她的性别角色规范内化于心,她们既期待成功又害怕成功,对自身成功怀有恐惧心理。这些因素也导致她们对职业发展的热情和进取心不足,M女士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3. 身体化的象征资本与“吃青春饭”

制造业和服务业是流动女性的主要就业部门。M女士先是干了5份工厂操作工,中间短暂做过20天的业务员,后来的几份工作都是在服务行业,分别是酒吧服务员和美容美发店的美容师,用M女士的话即是“一直干女人的活”。谈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同,她说“在工厂,需要吃苦耐劳;到服务行业,更需要外在形象和灵活”,也就是动作娴熟、埋头苦干的工厂女工最受欢迎,而服务业更注重身体以及通过身体展现出来的女性气质。

在这个特定的市场交换场域内,女性的身体既是“身为女人”的象征资本的载体,又在场域中居于被消费的位置,因此,年轻貌美、温柔体贴等女性特质都可被打造成用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而象征资本在交换的同时就转化为经济资本了。来自农村的女性善于利用女性气质和特征来迎合不同男人的口味^[16],一些年轻貌美的流动女性选择“吃青春饭”来改变自身处境^[17]。M女士看到这一点,并利用身体化的象征资本来追求个人发展。“女人跟别人接触,亲和力多

一点。而且女人长得美,会打扮。像我接待男顾客,撒娇起来,没几个男人会拒绝”。她们创造出一种为男性觉察到并接受的女性气质——性感的身體、柔美的声音、时髦的服装,以及父权文化所塑造出来的温柔、热情、微笑、谦卑等,来保证自己有更好的获利空间。

虽然这种自我表现的灵活性可以为个人发展创造空间,但女性的机会在更大的权力关系中仍然受限^[18]。外表光鲜亮丽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她们的职业价值常常被贬低,并背负着文化中的污名^[19]。对年轻貌美的要求使得这些流动女性只能短暂地“吃青春饭”。事实上,在酒吧,M女士多次受到男顾客的骚扰,碰到这种情况,她不能反抗,主管也帮不了她。潘毅指出:身体痛楚是抗争的次文体,是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父权制等多重压迫的一种呈现^[20]。无以诉说的委屈会通过一些身体症状表现出来,M女士在酒吧工作一段时间就出现了月经失调、满脸长痘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身体不适。可见,身体化的象征资本虽然给流动女性带来了更好的经济收入,但实际上并没有提升流动女性的社会地位,反而是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不平等。

4. 弃工从商与“跨域行动者”

打工的流动女性身处劳动力市场底端,职业发展空间非常有限,而且受制于人、缺乏自主性,打工仅仅是为了谋生的不得已选择。M女士在打工过程中遭遇了被同事排挤、被主管责骂、被顾客骚扰等等委屈。她一直梦想着自己当老板,这一梦想终在婚后实现。她与当时同在杭州打工的丈夫一起弃工从商,开起了一家美容美发店。谈及开店的动机,她说:“给老板干活,做得再出色,还是打工的,别人也不会肯定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想让你走,随便找个机会就让你走,凭什么我非要受气?还不如自己做(生意),可以按自己的想法来……还可以顾到家,小孩也可以自己带。刚开店的时候小孩还没生,想着开店以后带小孩也方便,也不用看别人脸色。综合这些因素就决定去开店了。”

在M女士看来,自己经商意味着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更大的发展空间。那些有抱负的打工妹不会把打工作为职业生涯终点,而是把创业经商、自己当老板视为人生的重要理想和目标。对流动女性而言,经商的另一好处是可以兼顾到家庭需要。开店几个月后M女士生下了女儿,与多数流动女性回家生育、把孩子留在老家由祖辈抚养不同,她选择在城市生下孩子,并一直将孩子留在城市,由自己带大。这种选择与她

与丈夫一起经商、当起老板娘息息相关。不过，在这个场域内，劳动力分工要求女性需要把家庭外的生产角色和家庭里作为妻子、母亲和主妇的再生产角色结合在一起。一方面，M女士作为老板娘的社会角色相当活跃；另一方面，除了积极作用于生意场，扮演丈夫事业好伙伴的角色，她同时在家庭场域内扮演着丈夫的好妻子、子女的好妈妈这样的家庭角色，是家庭与生意场的“跨域行动者”。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流动女性而言，与其说经商是因为打工的职业发展空间有限，不如说是为了追求时间的自由（可以灵活兼顾家务和照顾子女）。

三、劳动参与的自我解读： 超越限制、强调意义

在潘毅看来，流动女性承受着来自国家、资本和父权制的三重压迫^[21]；而对于流动女性自身而言，她们对进城后的劳动参与有着怎样的现实解读？虽然M女士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但她更是看到并充分利用了自身的主动性，通过“用脚投票”来获得主动权。在追求个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玻璃天花板效应”和自我放弃，难以获得职业晋升，但她转而灵活地使用身体化的象征资本来吃“青春饭”。然而，她也意识到这并非长久之计，当具备一定条件时，与丈夫一起创业经商，对M女士来说，开店不仅可以摆脱打工的限制和受气，更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在生意与家事之间“跨域”行动。

M女士对自身劳动参与的解读还超越劳动本身，突出城市劳动参与带给她的收获与意义。“女人如果不出来，在农村一辈子种田做家务，也没有自己的钱。现在工作辛苦，但哪样工作不辛苦？能有一份收入就不错了”，从这个描述我们看到，M更关注的不是在劳动参与中的弱势境遇，而是参与有酬劳动改变在农村无收入的状况，并视独立获得收入为一种“进步”。她将传统性别观念纳入对自身劳动力市场遭遇的解读中，认为自己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一份工作，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已经是非常满意了。她对现状的满意，也基于与农村同龄人的比较，“像我的邻居，也是我小学同学，没出来工作，（跟我）差别很大。我们年纪差不多，她结婚早，上次我回老家见到她，看到她真的跟以前很不一样，皮肤没保养，穿着也是农村的打扮，讲的话都是过去的，以前怎样的。（她）活在过去的人生中，好像都没有未来”。M女士不与城市女性相比，而是与在农村的同龄人相比，并从中

得出自己在城市劳动参与中获得的“现代性”的结论。同时她还强调参与劳动让她“长了见识”，有机会跳出农业和家庭生活既有的限制，并增加和家庭以外的互动，在谈话、与人交往、见识、拓展人际关系、未来规划等方面都有进步。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是付出劳动力，也产生有意义的劳动^[22]。尽管流动女性在进城后劳动参与中的状况不容乐观，但从M女士的个人感受来看，她呈现出的主观体验却是乐观而有意义的。在传统农村，家庭对性别角色的认定，使多数女性劳动力的价值被忽视，因此，相比于留守农村的同龄女性和在农村时的自己，进城后的女性农民工从事有酬工作，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变得明显而受家庭认可，自己也更有经济支配权，这让她们体验到个体的价值，从而实现了劳动意义的升华。

需要说明的是，流动女性通过劳动参与不会必然导致地位的提高。虽然她们选择离开父权家庭、进城打拼本身就是对传统性别模式的抗争^[23]，但这并没有全然地解除施加在她们身上的各种规制。她们所进入的劳动场域，其场域规则是雇佣关系与她们身上传统性别角色的惯习相结合的产物。在打工时期，资本所有者利用这种惯习，使流动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在服务行业，资本所有者利用流动妇女的情感和身体，通过身体化的象征资本和女性气质来获利。而选择经商虽有更大的可支配度和自由度，但跨界于生意场和家庭，实际上仍是传统性别阶层结构的复制^[24]。流动女性更多地把劳动参与视为满足个人及家庭基本需要的生存和发展谋略，而不是挑战或颠覆传统社会性别制度的手段。

四、劳动参与中的“场域-惯习”： 生成的结构与能动的策略

布迪厄从自己的人类学研究中，从对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经典社会理论的反思中提炼出“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用以呈现社会行动者与其社会环境相互形构的关系。场域是由多种客观关系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惯习是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一个开放的不断随经验而变的性情倾向系统^[25]。场域强调社会行动者离不开他的处境，而非脱离环境的抽象个人，如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惯习则强调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动者已经身体化了的各要素，如性情倾向、象征资本、理所当然的观念（如本文中的传统性别机制）等。此外，场域位



置这一概念强调具有一定惯习的行动者的互动情境，它将与在场域中位置相对的行动者互动并发展出相应行动策略，在此过程中积累和转化资本、进行行动者自我和场域自身的再生产。就 M 女士而言，对其进城后的劳动参与可以进行如下梳理。

“场域”是 M 女士从农村共同体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受气就走”“用脚投票”的主动权，恰恰是离开农村共同体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后这一场域对行动者的赋权——自由流动的权利（或资本），这是依附于土地的农村生活所不可能赋予的。正是由于进入了劳动场域后拥有的这种自由流动权，流动女性才具备了选择权，即可以选择退出，并能在雇主的对待面前运用此权能并展开相应的行动策略——或留下或离开、转行。在这个过程中，她积累了经验与阅历，而这种资本积累和自我再生产的过程也帮助她形成了新的惯习——自由劳动者的惯习。

此外，“惯习”在 M 女士身上体现为以下四方面：个体的性情倾向——吃苦耐劳、敢于冒险；身体化的象征资本——年轻漂亮、女性性别角色认同；文化资本——在面对升职机会时，由于缺乏文化资本而自我放弃；自然化的观念分类——如初中文化 / 大学生，男 / 女以及女性固有的生命历程（胎产乳、家事等）。这也让 M 女士在市场和企业的场域中有了自己独特的流动轨迹。而场域位置的不断变换也让流动女性在生成的结构中产生了能动的策略。如 M 女士在劳动力市场意识到自身优势所在，即“女人比男人好找工作”；在企业内部市场，意识到男 / 女性别机制的不同与玻璃天花板的设置。频繁跳槽、寻找不同的工作就是在尝试劳动力市场这个场域内的不同位置，她在此过程中习得了老板 / 打工者的分类图式，进而将经商与自主独立联系在一起，将打工者与受制于人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服务业的场域位置中，传统的性别角色的不平等关系被纳入对女性情感劳动的生产和消费中；最终 M 女士与丈夫创业经商，并通过开店创造了一个子场域，实现了自身从打工者到老板娘的位置转变。在此过程中，她还通过“跨域行动”满足了女性生命历程中胎产乳的需要。

五、结 语

M 女士的经历表明，在市场和父权制传统的压力面前，社会亦有其自身顽强的生长能力，而这种生长能力恰恰是社会行动者在与市场与父权制传统的不断

互动中积累的资本和习得的行动策略使然。具体而言，M 女士先后经历了两次个体“独立”的历程：第一次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让她摆脱了对土地和传统家庭的绝对依附，成为可以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第二次是从雇员到雇主、从打工者转变为老板，这使她不再流动，而真正拥有了令她获得稳定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如果说第一次的参照群体是留守农村的同龄女性，那么第二次的参照群体就是打工者。M 女士当然距离对市民身份的认同还很遥远——因此她不与城市女性比较。与这个历程同时出现的是一种对原有的、以 M 女士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重组，即打破了农村礼俗规范的等差，形成了新的差序格局，其自内而外是自己的家庭和生意、农村同龄女性、打工者、陌生的城市女性。这种差序格局的重组而非打破体现了农村共同体中的礼俗与城市社会中个人独立观念某种程度的结合，一种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自发调和。

在“场域 - 惯习”视野下，流动女性在进城后的劳动参与中，一方面，采用妥协的姿态应对劳动力市场内的性别不平等；另一方面，她们又积极发挥个体能动性以谋求职业发展——从进城之初“有工可做就好”的工具性取向，到采用身体化的象征资本谋求职业发展，最终选择经商作为新出路。在这个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是流动女性一直在劳动参与中寻求象征意义和生活意义。她们超越性别限制，赋予劳动新的意义，强调通过劳动参与获得收入和经济独立，以及由此而生的能动性^{[26][27]}，并由此实现劳动参与意义的升华。可见，作为社会行动者的流动女性进入城市这个新的社会环境后，不仅感受到其中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也利用了其中的“机会”和“空间”。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行动者作为主体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从观念到身体，到具体的行动策略，并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可以自我认同的社会位置。因此本文也呈现出与自由主义话语和批判论不同的理论视角，即通过“场域 - 惯习”来展现出社会行动者自身的意义世界、行动策略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

[本文为 2016 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地项目（2016JD33）、杭州市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专项课题（2016RCZX26）的研究成果]

邱幼云：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 / 杨守建

参考文献:

- [1] Kabeer, N. The Power to Choose: Bangladesh Women and Labour Market Decisions in London and Dhaka [M]. London: Verso Books, 2001.
- [2] Fussell, M. E. Making Labor Flexible: The Recomposition of Tijuana's Maquiladora Female Labor Force [J]. Feminist Economics, 2000, 6 (3): 59-80.
- [3] [21] 潘毅. 中国女工: 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 [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 [4] G. Sen & C. Grown. Development Crises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Third World Women's Perspectives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 [5] 金一虹. 城市化——妇女发展的又一机遇与挑战 [J]. 妇女研究论丛, 2001 (6).
- [6] [27] 佟新. 劳动市场、性别和社会分层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0 (5).
- [7] Z. Liang and Y. P. Chen. Migration and Gender in China: An Origin-Destination Linked Approac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4, 52 (2): 423-443.
- [8] 宋月萍. 社会融合中的性别差异: 流动人口工作搜寻时间的实证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0 (6).
- [9] 梁玉成, 周文. 劳动参与过程的社会学研究 [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4).
- [10] Wright MW. Desire and the prosthetics of Supervision: A Case of Maquiladora Flexibility [J].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01, 16 (3): 354-73.
- [11] Schervish, Paul G. The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Unemployment: Vulnerability and Power in Market Relation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 [12] 佟新, 濮亚新. 研究城市妇女职业发展的理论框架 [J]. 妇女研究论丛, 2001 (3).
- [13] Treiman, D. J.. The Work Histories of Women and men: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Need to Find Out [A]. in A. S. Rossi (ed.), Gender and the Life Course [M]. New York: Aldine, 1985: 213-231.
- [14] 姚先国, 胡凤霞.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研究问题综述 [J]. 生产力研究, 2009 (17).
- [15] [美] 艾米莉·洪尼格. 姐妹们与陌生人: 上海棉纱厂女工 1919—1949 [M]. 韩慈,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 [16] [18] Tiantian Zheng. From Peasant Women to Bar Hostesses: Gender and Modernity in Post-Mao Dalian [A]. In Arianne M. Gaetano & Tamara Jacka. On the Move Women and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80-108.
- [17] 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Elizabeth J. Perry & Mark Selde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M]. Routledge (Second Edition published). 2003: 162-186.
- [19] 马冬玲. 流动女性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 [J]. 浙江学刊, 2009 (5).
- [20] 潘毅. 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 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 [J]. 社会学研究, 1999 (5).
- [22] 马克思, 恩格斯. 资本论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23] 邱幼云. 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女性的流动轨迹 [J]. 青年学报, 2016 (4).
- [24] Niehoff, Justin D. The Villager as Industrialist: Ideologies of Household Manufacturing in Rural Taiwan [J]. Modern China, 1987 (13): 278-309.
- [25] [法] 皮埃尔·布迪厄, [美] 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 [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 [26] Kabeer, 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Gender and Development, 2005, 13 (1): 13-24.

(上接第 89 页)

- [12] 裴雨玲. 法国青年挑战计划及对我国青年创业的启示 [J]. 青年工作, 2008 (4): 15.
- [13] 赵柯. 德国如何促进青年创业 [J]. 政策瞭望, 2015 (12): 49.
- [14] 佚名. 国外政府如何推动“大众创业” [J]. 人民文摘, 2015 (7): 46.
- [15] 吴玮. 简析美国高校科研资金投入的构成 [J]. 全球经济技术瞭望, 2009 (3): 41-44.
- [16] Lynskey, M.J.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activity in Japanese technology based start up firms [J].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004, 22 (2): 159-196.
- [17] 侯飞, 葛宝山. 日本创业环境优劣势分析及启示 [J]. 现代日本经济, 2014 (4): 68.
- [18] 佚名. 韩国: 经济规模排名第 13 位 创新精神排名仅为第 32 位 [EB/OI]. http://www.taiwan.cn/xwzx/gj/201501/t20150126_8825547.htm, 2015-12-08.
- [19] 王玉帅, 黄娟, 尹继东. 创业政策理论框架构建及其完善措施——创业过程的视角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26 (19): 112-115.
- [20] 杨邦勇. 构建我国大学生创业政策支持系统的理论思考 [J].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10 (2): 103-108.